



陈斐琴 杨远富 著

刘伯承军事 理论探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刘伯承军事理论探索

陈斐琴 杨远富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泳
封面设计：解建华
技术设计：古蓉

刘伯承军事理论探索
陈斐琴 杨远富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1/32 印张 8.75 插页 4 字数193千
1991年 5 月第 1 版 1991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1283-7/E·9 印数1—2,000

定价：4.05元

前 言

刘伯承元帅是我们党的老一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外著名的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和军事翻译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

刘伯承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中，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功勋卓著，对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和邓小平一起，组织指挥了许多重大的战役战斗，总结了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及其军事理论著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他的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早已引起国内外人士的高度重视并对之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

本书从七个方面，对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进行了比较系统而综合地探索。探讨了他70余年的军旅生涯、战略战术思想和原则、军事哲学思想、谋略和指挥中的辩证思维、政治建军思想、军校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及其丰富的知识构

成。从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揭示了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杰出的革命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是他熔古今中外兵法于一炉，并在战争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能运用辩证思维进行谋略和指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重视军队院校建设；以及要驾驭战争和赢得战争，必须具备较全面的知识结构等等的深刻道理。

本书的代序，是刘华清同志的研究文章《刘伯承军事理论初探》。他紧密围绕“军事与政治”、“军事战略与政略”、“全局与局部”、“作战指导与‘五行术’”、“游击战与运动战”、“正规化、现代化建军”六个问题，从宏观上提纲挈领地刘伯承军事理论的深邃内涵，作了全面而深入浅出的论述，为我们打开刘伯承军事学术宝库的大门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刘伯承军事理论指出了方向。

虽然我们水平有限，研究又很不够，但本书能在我们党诞生七十周年之际出版，相信对于学习刘伯承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学习他的优良作风和崇高品质，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对于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 者
1991年 月

刘伯承军事理论 初探(代序)

刘 华 清

刘伯承是一位有丰富革命战争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投身于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他发动了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并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南昌暴动，开始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反“围剿”和长征中，他排除艰险，迭挫强敌；抗日战争时期，他和邓小平同志率一二九师转战华北敌后，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克敌制胜；解放战争时期，他正确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在上党、平汉、挺进中原、淮海、渡江、解放西南等战役中，屡建功勋；建国后，他在培养我军高级干部和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方面，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刘伯承同志既是一位有远谋韬略的军事战略家，又是一位能亲临现场，具体指挥作战的帅才。几十年里，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军事著作和毛泽东军事学说，研究古代兵法和外军战略战术，总结自己用兵打仗的经

验，撰写了大量的军事论文。他的军事理论，为毛泽东军事科学体系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他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仅就刘伯承军事理论上的几个问题，根据个人的学习体会，作一粗略的探讨。

一、军事与政治

刘伯承的军事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从事军事理论活动，也将近40年。他的军事理论，植根于肥沃的战争实践土壤之中。刘伯承是从1926年开始从事党的军事工作的，但在此以前，他已经受了15年武装斗争的磨练：1911年，他投入到反对清政府的起义的洪流中，经过将校学堂的学习，成为出类拔萃的军人；1916年，他在护国讨袁战争中，带领一个支队冲锋陷阵；1922年，他在痛击北洋军阀吴佩孚战斗中，率领川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克敌制胜。在战争实践中，他不断地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以指导战争。当时他是同盟会创立的川军第一军第二混成旅中的一个团长。但四川督军熊克武、一军军长但懋辛、旅长张冲、李蓐等，在战略、战役、战术上，都接受了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原则。这是从这支军队留下的阵中日记和命令、来往书信中发现的。在刘伯承担任第一军第一路指挥官时，他下达的一道关于侦察工作的命令，就显露了他极端重视侦察，研究敌情，从实际出发指挥作战的求实精神。而他在1923年4月14日所写的《呈请撤差查办》的报告，更显露了他过人的胆略，雄奇的辩才和文才。这种胆略、辩才和文才相结合，在他后来的军事文章里，不断地得到发展。但在他早期的军事活动中，使他感受最深的是政治上的苦闷和探索的艰辛，

他时常希望“取军事最后之胜利，而拯人民于水火”。但战争总是陷于军阀间的互相混战，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昔者川军混战，吾辈时或并辔杀敌，时或相对交绥，事迹虽是英勇，究属同室操戈。”而人民却越加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昏暗的现实使刘伯承朦胧地认识到，仅仅有武装力量，而没有革命党的领导，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1926年，在吴玉章和杨闇公两人的影响和介绍下，刘伯承终于从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在思想认识上实现了新的飞跃；战争是解决政治矛盾，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军事一刻也离不开政治。从此，他着眼政治，运筹军事。军事斗争从属于并服从于政治斗争，成为刘伯承军事理论的根基。

1926年11月27日，他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是他的第一篇军事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把军事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把军事战略方针，置于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之下，把军事运动建立在党所领导的民众运动基础之上，并与之紧密地结合起来。1927年，刘伯承在谈南昌暴动失败的教训时，首先从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政治角度找原因。他指出，党的领导没有发动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起来为土地革命而战，并联合工人群众首先在两湖组织暴动，与国民党作斗争。在军事行动上，他从政治策略上分析利弊：“有人事后说，当时就由长汀入据漳州一带，充实兵员后再取广东，也是一个办法。但军事是根据政治决定的，由东江取广州是党于事前由政治上决定的，广东方面工作亦根据这一决定有相当之准备，所以无人提议及此问题以

外的事，且在当时兵力太弱，迫切需要者在兵力补充，欲其速得，不能不望之联合于东江农军，故必速到东江。”^①

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用政治统帅军事，是刘伯承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处理军事问题的准则。1938年底，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而在敌后战场则不断与我军制造磨擦。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在率领一二九师粉碎日寇“扫荡”的同时，还要领导晋冀豫军民与国民党军开展反磨擦的斗争。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合法”、“统一”为名，限制我党领导下的军队在敌后的发展，并不断增派大军，进至抗日根据地周围，妄图向人民“收复失地”。当时，为了劝阻国民党军朱怀冰等部停止反共，共同抗日，刘邓一方面主动找朱怀冰、石友三会谈，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并亲自摸清一二九师附近的国民党各军的政治情况，制定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顽军进行争取工作和说理斗争；另一方面，则动员广大军民，坚决反击顽军的军事挑衅，使我军在反磨擦斗争中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这样，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刘伯承能稳定地掌握住军事斗争的方向，胜利地完成党赋予一二九师的军事任务。

在总结两年来华北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刘伯承同志提出了“打胜仗的战术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这一英明论断。他说：“无论现代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兵器、新式火炮、机关枪之类，怎样精良到了不得，总是死的，都要靠活的

^①《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第10页。

人来使用；如果人的质量（包括政治的、军事的与纪律的训育和素养）不强，那么只有打败仗”。他说，我们八路军是工农的军队，“由于有良好的政治情绪与充满的战斗精神，曾经用很劣势的原始武器，……换来了机关枪、快枪和大炮乃至飞机，武装了自己，壮大了自己。所以我军中有一句流行的话：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些已成为我八路军的光荣传统”^①。因此，他总是告诫部属，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更需要我们健全部队的政治生活，提高政治修养，使每一军人尤其是干部，必须团结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意志下，坚定抗战致胜的信念为民族牺牲的决心，熟练技术战术，发扬英勇果敢、机断行事、协同动作、刻苦耐劳、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的作风。当分遣作战，或游击或侦察之时，更应具有良好的政治情绪，充满的战斗精神，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战胜蒋介石，刘伯承通过讲演和撰写文章，号召全体指战员进一步地同人民结合，克服某些幻想、松懈、麻木和骄傲的有害思想，提高政治警惕，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为此，他倡导在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自己动手，积极生产，厉行节约，以增加解放区的财富，并以各种方法帮助人民恢复在八年抗战中消耗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在国民党即将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之时，刘伯承同志号召指战员要把拥政爱民工作做得比任何一年都要好。“要真正做到成为执行政府政策、法令的模范，尊重政府人员，切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赞助农民减租运动，学会做群众工作，这就

^①《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第56—57页。

需要有‘做人民的勤务员’的思想，纠正军阀主义的错误思想。”由于刘伯承同志在抓军事问题时，首先抓人民军队的政治建设，提高人员的政治觉悟，鼓励军民和敌人坚决斗争到底，同时，又根据人员战争的特点，狠抓人民武装建设，同时抓各种群众组织和各级人民政权，地方党组织建设，增强了人民战争的总体作战能力，空前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因而，当国民党军大举进犯时，晋冀鲁豫军民同心协力，英勇奋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为在全国范围内转入战略进攻准备了条件。所以，刘伯承同志从斗争实践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今天斗争的真正内容，是全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各种斗争，不单是军队之功。”“我们作战不但要军事，而且特别要政治；不但是军队，而且特别要有群众武装斗争。”刘伯承关于军事从属于政治的理论，正是来自他几十年丰富的战争实践。

二、军事战略与政略

一个国家的政治战略（政略），是达到党和国家总的政治斗争目的方略。作为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必须坚决执行。军事斗争既然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最高形式，或一种手段，那末，军事战略就必然要直接服从于政治战略的需要。每一个军事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只有充分认识军事战略的政治目的，并服从政治战略，才能使军事行动不致违背政略的方针和方向，并真正领会和认真贯彻军事战略的意图。

从泸顺起义到南昌暴动，刘伯承同志深切地感到武装斗争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但他同时认识到，枪杆子必须听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指挥，战略应服从政略，才能使武装

斗争赢得胜利。因而，刘伯承在其军事生涯中，经常用战略服从政略的思想教育部属和指导自己的行动。长征中的“凉山结盟”，成功地团结少数民族支持红军、支持革命，就是刘伯承战略服从政略理论的生动实践。

1935年5月，红军北上途经大凉山彝族区。当时，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使彝民对汉人疑忌很深，他们成群结队，打枪射箭，阻挠红军通过。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处境中，红军先遣队中有人主张立即用武力解决，为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北上开辟通路。作为红军先遣队司令的刘伯承深深懂得，那样一来，破坏了民族团结，违背了党的政治策略，即使军事上胜利了，政治上却失败了。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红军，是绝不允许这样做的。于是，他教育部属向彝族同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他自己则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拜为兄弟，用政策的感召力去和彝民达成友好。后来，小叶丹不仅积极组织群众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而且还将彝民组织起红军沽基支队，团结和带领群众，同国民党军阀部队作斗争。现在，一面绣有“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字样的战旗，已作为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象征，被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满怀激情地得出下面的结论：“只有毛泽东同志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指导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导红军奇迹似地战胜千辛万难，完成长征，走向新的胜利。”^①

^①《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第736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动员一切力量，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成为联合国内外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广泛统一战线活动，从政治上、军事上彻底战胜日寇的政治战略。为实现党的政治战略，刚刚进行改编，进入预定战略展开地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立即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以有限的武装力量，分散到敌后广大地区，发动群众，抓紧时机，积极打击敌人，为实现党的政治战略，刘伯承同志向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教育。1937年11月，他在《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的讲演中，提出了组织全民族抗战和消耗日本强盗力量等战略性任务。他说：“到处宣传日本强盗灭亡中国的毒计暴行，提出并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当前群众斗争的口号。特别要表现本身忠实于民族解放，收复失地，与华北、山西人民共生死同奋斗的模范行动。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战争……以增加抗日力量”^①。为了实现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的政略思想，刘伯承提出要“到处建立自卫军的组织，特别是繁殖游击队、义勇军，吸引民众斗争的先进分子加入自己队伍。”“到处袭击、伏击、围困敌人，并宣传我们愿联合台湾同胞，朝鲜民族及日本劳苦民众，特别是在日军中的群众，约其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或约其要求放他们回国，用日本文字散写于日军到达之地，……使日本强盗灭亡中国的力量，由受损害、打击、瓦解而归于消灭。”要“协同友军作战”，“在同蒲路北段及正太路沿线之敌军的侧背，进行攻击，以配合正面友军的防御，给了友军以很大的助力。迄太原失守，国

^①《刘伯承军事文选》，第69页。

民党军队主力向南撤退，而华北同胞惨遭屠杀之际，我党我军为要从敌人侧背牵制敌军，以掩护友军起见，为要结合华北广大之人民，保卫身家，保卫华北起见，提出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口号，实行坚持敌后斗争，以加强协助友军作战。”这就增强了华北人民的抗战信心，争取华北人民群众各地抗日武装同我党我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稳住了华北对敌斗争的局面，使之走向抗战胜利。同时，一二九师又分遣部队，更深入敌后——冀南、鲁西北广大地区，特别着重于发展群众游击战争摧毁敌后交通，大量消耗敌人，组建地方人民武装，作为主力部队的得力助手，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使日寇在太行山根据地内的一次次“扫荡”和蚕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为了组成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力量，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在晋冀鲁豫根据地进一步狠抓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发展进步势力，打击和孤立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妥协投降的群众运动。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与国民党的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寇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敌后我军，而国民党则由积极抗日逐渐转到消极防御，伺机反共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为战胜凶恶的敌人，转变日顽夹击的局面，刘伯承提出了“动员全体人民，一致参加抗战”的号召，他说“只有千千万万的民众与军队和政府团结奋斗，才能求得一致的生存与解放。”因而，他依据政治战略，制定了“综合群力”的战略战术，在华北敌后战场，成功地实现了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进行全面战与全力战，打败敌人总力战（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总合）的战略思想，以雄伟的力量战胜了敌人。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抗战胜利后的

中国向何处去？在走向光明和走向黑暗的激烈搏斗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政治战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就从延安电令晋冀鲁豫各部队立即扩充野战军，准备打击沿平汉、同蒲路北犯的国民党军。当时，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大部处在分散游击的状态，要对付国民党军的大举进犯，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刘伯承从延安返回晋冀鲁豫后，不失时机地迅速组成野战纵队，从小规模的游击战转到大规模运动战的轨道上来，筹划有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他还针对阎锡山军队装备齐全、长于防御的特点，亲自起草了《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明确了打运动战的战法，统一了部队的战术思想。当阎军以13个师的兵力，自临汾、太原向上党进攻时，刘伯承正确果断、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彻底消灭了进犯之敌，打赢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仗。接着在平汉线进行了邯郸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三个军数万人，彻底粉碎了蒋军企图打通平汉铁路、分割占领我华北解放区，消灭我军，破坏根据地的罪恶目的。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在战略全局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局部。两次战役的胜利，不仅是我军军事战略转变后一次重大的胜利，它使我党在政治战略上大大加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地位。

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在晋冀鲁豫一面指挥部队对敌作战，一面组织部队配合地方党和政府，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以彻底打败蒋介石，实现党的政治战略的目的。

三、全局与局部

刘伯承的战略思想与作战谋略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全局利益出发，思考问题，善于用战略眼光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怎样从局部与整体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上，处理好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刘伯承简要地归纳成这样的一句话：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大道理要用小道理来充实。他的观点是，当处在全局领导的位置上时，要善于调查研究各个局部，使各个局部指挥者按照全局总的意图机断行事，使他们这个局部对全局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而当处在局部的地位上时，则要认真研究上级的全局意图，充分发挥自己局部的力量，为全局的胜利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甚至不惜牺牲局部，去争取全局的胜利。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全党全军好比是一个交响乐队，各个乐器的演奏者都必须听从乐队指挥的指挥，才能演奏出和谐的交响乐曲。

刘伯承同志以他的光辉实践，体现了他着眼整体，统筹全局的战略思想。他作总参谋长时，能自觉地站在统帅的阴影里，对全局施展宽大的活动；在他处在局部、一个战略区指挥员的地位时，则高瞻远瞩，把自己注意的中心，放在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问题上，使局部服从和服务于全局。在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他率部挺进大别山，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1947年6月30日，刘邓指挥大军以迅猛的动作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实施战略突破，运用高超的指挥艺术，在20多天的时间内歼敌九个半旅，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这一行动，在全局上为南下大别山发起战略进攻创造了

有利的条件。接着，根据敌我态势和总的作战任务，刘邓利用敌人对我军行动判断的错误（认为我军是：“不能北返而南窜”），运用战略上的突然性，一下子直插大别山，中间未作停顿。为了全局的需要，刘邓一再教育部队克服远离根据地的困难。刘伯承同志指出，挺进大别山是“革命的历史给了我们这个任务”，“我们要从全局来看大别山，全局的胜利，我们是其中的一份。打仗有的吃肉，有的啃骨头，过去山东啃骨头，我们在冀鲁豫就吃肉，这次我们也啃一次骨头”，正是这种高度全局观念的“啃骨头”精神，统一了十余万大军的跃进步伐，使上下同心同德，以大局为重，浴血奋战，在大别山地区站稳了脚跟，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思想付诸实现。又如，在渡江战役中，刘伯承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溃乱的趋势，根据黄山、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经报总前委，“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先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即可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实践证明，由于二野与三野部队密切配合夺取了杭州，扩大了原定的战役规模，歼击了更多的敌人，并及时控制了浙赣线，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在战略全局上形成了有利于我西进（赣）南下（闽）的态势。

主作战与支作战，也像“吃肉”和“啃骨头”的关系一样，成为局部和全局胜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刘邓大军进军中原后，经过多次作战，兵力损耗近三分之一，同时又分遣三分之一的部队用于建设中原战略基地，在野战军只剩下三分之一机动兵力的情况下，中原战场主作战的战略任务已转到经过整训